

# 从评奖看上海地区的文学创作

陈思和

第二届上海中长篇小说大奖评选工作已经结束，象上届一样、给人留下了几分兴奋几分遗憾，似松了一口气，又似情犹未尽了。说其有几分兴奋，是这一届入围作品的质量明显高于上届，甚至出现了新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长篇小说，这无疑标志了1989年以来的文学低谷已经被突破。)但说其有几分遗憾则复杂得多，比如在总体创作水平上还不够理想，尤其是中篇小说创作；比如还有不少好作品因各种原因未能入围，但我觉得最大的遗憾是通过评奖让我强烈地感受到，上海的整体创作水平在全国文学创作中远远不居上游地位摊为生活在上海的一个文学工作者，说出这样一个话题实在有些难堪，但却是一个事实：这次评奖的结果是长篇小说一、二等奖得主均为外地作家，而且位居三等奖的上海作家作品在整体艺术上与一、二等奖的差距相当明显，从中篇小说创作状况看，上海作家虽有佳作，但也给人势单力薄之感，与同等获奖的外地作家作品相比，仍有一段距离。

上海是个现代化的大都市，在文化上不应有地域的概念。上海的文学刊物都是面向全国，许多外地作家都是因为在上海发表了优秀作品而一炮打红；上海的文学评论家也都是面对全国文坛，在全国文学创作的总体水平上发现新人新作而不为地域观念所囿。正如有位评委说的，上海应象30年代那样，把外地作家在上海发表的作品理所当然地看作是上海文学史的一部分。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化的境界，但在户籍制度严格、人的居住自由尚未真正实现的今天，把上海本地作家作为文学创作的主体来看待，恐也是无可回避的。上海中长篇小说大奖把评奖的范围定于在上海发表的作品而不局限于上海地域的作家固然是有识之见，但在评奖的结果里如此清晰地显示出上海与外地的获奖作品之间的差距，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从这次入围作品来看，山东张炜的《九月寓言》、浙江余华的《活着》、江苏朱苏进的《接近于无限透明》、山西李锐的《旧址》、陕西杨争光的《老旦是一棵树》、湖北池莉的《白云苍狗谣》、湖南何顿的《生活无罪》等作品都具有相当强的竞争力，尽管最后的评选未能使这些作品全部获奖，但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些作品在全国近年来的中长篇小说创作中都代表了较高的水准或是较有潜力的探索。而上海入围的中长篇小说创作中真正能与之匹敌的，唯有王安忆的《香港的情与爱》、《文革轶事》和李晓的《叔叔、阿姨、大舅和我》(可是这些作品最终也未能全部如愿获奖)，不仅数量上处于弱势，从艺术表现上看，《香港的情与爱》由于议论过于冗长使一部分读者失掉了阅读耐心；而李晓的那部作品也过分地流露了对叙事技巧的偏好，从孩子回忆里追寻一段历史大悲剧固然产生举重若轻的艺术效果，但也因此而部分地失掉了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当然这样的对比不是衡量上海地区文学创作的唯一可靠的标准，因为确实还有一些优秀的作品未能入围参加评选，如王安忆的长篇《纪实与虚构》，竹材初长篇《女巫》和一些先锋小说，但上海在整体创作上的弱势已成定局是摆明了的。对此，我们可以做一些具体作品的分析，来把握这次入围作品所表现出来的上海文学创作的差距(我之所以着重分析入围作品而不局限于获奖作品，因为在我看来，有些获奖作品所取得的成就并不如有些入围而未能获奖的作品)。

首先，这次评奖中呼声最高、并给以一致肯定的作品是张炜的《九月寓言》。乍读这部作品，我们首先能感觉到自己的审美经验被改变，进而又感受到自己的人生经验被改变，再进而使人感悟到的是文学与人生的传统关系被改变，而导致这种大改变的是弥漫在小说字缝行间的团团混沌

之气。小说虽以“寓言”名之，却抛弃了通常文学作品里把寓言当作人世间某种象征的手法而变得浑然一片；小说所描写的种种故事虽都与现实有关，却又是经过了艺术的蒸腾而变得似真似幻，读着小村人的故事，只觉得是一首无韵的民歌，野腔野调地唱着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人类历史，或称其为“史诗”也未尚不可。我读这部作品时不由想起巴金老人曾说过“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怕勺话，但什么样的艺术境界才是达到了无技巧？我知述：优秀的艺术作品不是对生活的技术性摹仿，也不是思想意识的艺术图解，更不是什么叙事语言的技巧，真正的艺术就是弥漫人生大地（甚至包裹了人生大地）的这团混沌之气，它把经验的人类生活完全覆盖住、融化掉，以至在混沌中重新显现出一个新的境界。读这部小说你会强烈地感觉到作家张炜胸间涌动着的一腔宽厚博大的情感之流泪而来，几乎冲垮了作为长篇小说形式的各种堤坝，肆意汪洋，淹过之处皆成风景。这样的“无技巧”恰恰是成就了艺术境界。

另外，在当代文学创作的走向上这部小说也展示了另一种可能性：艺术向民间还原。当代文学长期被政治所异化，一旦摆脱了政治话语，文学就变得无所适从，前几年文学创作的疲软媚俗都与其失去了价值依存有关。近年文学有向民间回归的趋势，它着重表现国家权威话语之外的种种民间话语，以此来重新估定文学的价值取向。《九月寓言》无疑是一部表现民间社会的经典性作品，整个作品由三个部分组成；现实中的小村故事、传说中的小村故事以及小村人流传的民间口头创作。其二、三部分本身就来自民间创作的文本，而第一部分在叙事上依然遵循了民间社会的特征：譬如那小村的年轻人在广袤的大地上无拘无束地奔跑、喧闹、欢腾，充斥着民间社会的自由和欢欣。由于它寄植于摆脱了国家权威话语束缚的民间文化形态，所以尽管也写到了现实农村的多重苦难，却没有象《古船》那样沉重的政治色彩，仍然使人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感和畅通感。很显然，由这样一部优秀作品来摘取本届长篇小说桂冠是当之无愧的。一部有份量的作品可以支撑起一个奖的艺术标准制高点，由于《九月寓言》加入评选并获得桂冠，使整个评奖活动的品质获得了提升，因为这部小说不但为当代长篇小说创作在艺术上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境界，而且也尝试了一条文学摆脱意识形态的宣传职能后可能发展的道路。当然《九月寓言》并非是完美无缺的，也不是唯一的样板，但它对当代文学创作提供的贡献是原创性的。张炜是个非常具有创造能力的作家，他的《古船》开了当代写家族史的长篇小说先河，由于《古船》的存在，几年后才出现的《白鹿原》、《旧址》等一批杰作就多少减弱了它们的原创性。但张炜并没有在已经取得的成就上停顿下来，五年以后他终于在《九月寓言》的民间世界中找到了新的突破。

张炜这样不断地自我突破，几乎是当代最优秀的小小说家们的共同素质。张承志、史铁生、王安忆、贾平凹、朱苏进等作家的创作变化轨迹都证明了这一点。在上海的作家群中，王安忆在不断地突破自我方面也同样是难能可贵的，由《雨，沙沙沙》的雯雯系列，到《本次列车终点站》的知青系列，从《小鲍庄》等文化小说，到“三恋”和《岗上的世纪》等性爱小说，她在创作上的飞跃几乎令人目不暇接。王安忆与张炜的不同之处在于，张炜善于厚积薄发，他的每一步自我突破同时也给文坛带来了一次大突破，而王安忆，每一次自我突破则要经过一系列的写作实践以后才慢慢地为人们所认识。她的《小鲍庄》获得成功，是在《大刘庄》等在中篇小说的形式结构上作了多次实验以后才取得的，同样，她对性爱场景的表现也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试验，才在《岗上的世纪》中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1989年后，她尝试用后设的视角来写小说，于是就有了中篇《叔叔的故事》和长篇《纪实与虚构》等。后者在上海作家近年来创作的长篇小说中也堪称独步，但从长篇小说的形式结构而言，似乎还留下了不少试验的痕迹，令人想起了她当年创作《大刘庄》的意义。王安忆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以后当会有更大的发展，但她试验得太密集，太频繁，多少减弱了这些试验的力度。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浮躁的大都市里缺乏山东农村那样苍茫沉静的地气所致。

但是我们似乎更应该看到，在上海的作家群里，象王安忆那样善于突破自己的作家几乎属凤毛麟角。也许在上海这样的都市里要成为一个作家并不难，一个作家发表了几篇作品以后就蜚声文坛也不太难，所以，轻而易举地步入文坛使一些作家们完全不理解作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具备怎样的素质。他们在艺术上浅尝辄止，很快就在自己已有的文字风格中停滞了；他们似乎只关心写些什么，而从未关心过应该怎样写才能最好地表达自己。这样的作家往往拥有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市民读者圈子，从表面上看，是作家们用自己的心灵世界在感化这样一批读者，可是这个城市每天都能复制出这样一批作家，城市读者以他们的处世眼光和审美心理塑造了作家，也软化了作家，把作家变成为某一种类型的符号。在这次入围的上海作家的作品中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功成名就、著作等身的作家，他们拿出来新作却激不起评委们的读解兴趣，也产生不出讨论的话题，就象是看到一张陈旧的地图，马上生出驾轻车就熟路的感觉。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新近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作家也同样表现了疲软的倾向，比如须兰，开始《宋朝故事》还在乱语说史中显示出现代人的历史意识，可是近来发表的连载小说和历史故事却表现出越来越漫不整口的态度，历史知识错误百出，胡编乱造毫无顾忌，这与当年王安忆为写家族史而穷读史书、遍访专家的严肃态度成为鲜明对比。

其次，这次入围作品中比较优秀的小说都表现出一种倾向：在语言艺术上追求精致完美的境界，在表现社会生活方面往往改变了直接摹写生活的传统写实手法，而是选取一个特殊的视角，艺术地突入生活的根须深处，创造出一个似真似幻、标新立异的艺术世界，从而也带来了对生活根本性的观照。长期以来理论界一直坚持认为，文学对生活的反映深刻与否，取决于作家对生活的介入是否直接和具体，譬如在文革后从“伤痕文学”，到“改革文学”的道路，以及后来一度成为文学主流的纪实文学，其结果是导致了文学离本体越来越远。这次入围作品中最优秀的作品，不是那些故意逃避生活的先锋派作品，而是通过独特的艺术处理对生活作了更为抽象更为丰富的表现。余华的《活着》是最典型的例子。如果从故事层面上看，小说中一家八口死了七口，除了主人公的父母死于败家子的不肖外，其余五口的死都与五六十年代农村的苦难现实有关，如果在这个层面上反复地渲染人的死亡，对现实的介入肯定会突出，但在艺术上却会给人产生重复和厌倦之感。余华现在故意绕过现实的层面，突出了故事的叙事因素：从一个作家下乡采风写起，写到一老农与一老牛的对话，慢慢地引出了人类生生死死的无穷悲剧……，读者仿佛从老人叙事里听着一首漫长的民歌，唱着人生的艰难和命运的无常，一个个年轻力壮的身体，善良美好的心灵，本该健康幸福活着生命都被命运之神无情地扼杀了，而本来最不该活着的福贵和那头老牛，却象化石一样活着，做着这个不义世界的见证。当作家把福贵的故事抽象到人的生存意义上去渲染无常的主题，那一遍遍死亡的重复象征了人对终极命运一步步靠拢的艰难历程，展示出悲怆的魅力。朱苏进的《接近于无限透明》也有类似的追求，朱苏进是位非常贴近生活的军人作家，他的创作一般都离不开对军队生活和各级军人的描绘。上届获奖作品《金色叶片》就是以对高级干部家庭的生动描绘而受到赞扬，而在《接近于无限透明》中，朱苏进选取一个因为有疯病才使自己的内在才华无拘无束地喷发出来，而疯病痊愈后默默地当上一个谨小慎微的干部终其一生的历程，在两个不和谐的艺术形象的鲜明对照中，包含了丰富的人生社会的内容。其实这样的故事在朱苏进的以前小说里也有所表现，但这部作品的特殊意义在于）认不是简单地诉说平庸的社会对天才人物的压抑，他利用主人公弥留之际欲言又止的启发和叙事者模糊的童年视角的回忆，利用精心安排的绝症病房（主人公的两段人生经历都安排在绝症病房里）和死亡环境，都有意地淡化了具体的社会背景而强化了的生命意识，使生命意识的高扬和萎顿成为当代两种人生境界的征象。应该说这两部作品都包孕着强烈的社会历史内容，但作家对社会历史的深刻认识和爱憎感情，恰恰是通过具体的社会历史的超越完成的，他们的自觉超越不但没有把读者引入逃避当代社会的虚玄幻境，而且能激发起对当代历史更加内在、更加复杂的认识。另外，我还非常惋惜杨争光

的《老旦是一棵树》的最后落选，在我近来的阅读记忆里，这部小说始终排列在当代最优秀作品行列之中。老旦是个西北地区的农民，他的愚昧软弱、他的仇恨心理、甚至于他的无赖的报复方式，都与中国几千年来农民遭遇的极度贫困落后相关联，老旦对人口贩子的恶行一次次对抗的失败，以至最后无可奈何的报复方式（站在仇人家的粪堆上，化成了一棵象征性的树），把一个愚昧民族的绝望和自暴自弃的劣根性暴露无遗。这部作品与上届获奖作品《赌徒》一样，作家以西北人特有的刚硬气质，刻画出这个民族的愚昧外表底下所蕴藏的最生动最痛苦的活的灵魂，在杨争光的作品里，我感受到了真正的心灵震撼，假如我们承认文学艺术真的能够反映社会的某些本质性的内容，并且能够产生对提高当代生活素质有益的作用，那么，我觉得近年涌现出来的中篇小说，正是对前十年中《人到中年》、《乔厂长上任记》这一类摹写社会生活和《风过耳》这一类泄私愤式的文学作品的扬弃和否定。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文学正是通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找到了介入社会生活的成熟方式——也就是历史的、审美的方式。在本届评奖活动中，我以为最优秀并且最能代表当代文学创作水平的作品，正是由这几部获奖和未能获奖的入围作品来体现的。

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上海作家近年来的创作，就不能不感到相当的遗憾。也许在创作数量上上海作家的作品并不在少数，——听说近年来就有十几部长篇小说问世，但问题是上海的大多数作家缺乏超越社会生活的能力，缺乏对人生、历史、文化、生命等给以综合把握的自觉。听到一句揶揄的话，说上海作家的创作“有苦劳而无功劳”，觉得虽然刻薄，多少有点同情：所谓苦劳，是作家们一个个都是埋头创作，又多又快，其中不少作品都能拥有相当数量的读者；但所谓功劳，似应指能在当代文学史上有重大贡献，能开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风气的力作，如果用后一个标准来衡量，恕我直言，近年来上海的文学创作是使人失望的。上海本来是个开风气之先的城市，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知青文学”等思潮和现代话剧的艺术创新方面，都曾领过短暂的风骚，涌现过王安忆、陈村、曹冠龙、李晓、孙甘露、竹林等比较优秀的作家，但是这种优势近年来正在失去，就以近年来被“炒”得很热的域外题材（一说留学生题材，一说打工题材）而论，在前几年小楂的作品树立起了一个较高的艺术标准以后，上海作家们的这类题材创作始终不能超越其上。尽管两次评奖都有这类作为通俗性文类而获奖的作品，但我以为正因为这类通俗性的创作倾向得到了鼓励，反而妨碍了作家追求更高艺术目标的自觉。作家们丧失超越生活的能力的标志之一，就在于无法摆脱对生活现象的机械摹仿和无法在粉碎了生活现象以后重新创造一个独特的想象世界。这次上海作家虽然有两部长篇小说获奖，但我觉得这个存在的问题仍未能得到很好解决并引起足够的重视。

上海中长篇小说大奖是当代文坛上举足轻重的文学大奖。它将是一个衡量上海地区在全国文学创作领域所居地位的一个标准：如果它能评选出每两年中在全国文学创作总体水平之上的优秀作品，就证明了上海这个文化环境对全国优秀作家有吸引力。这届评奖由于《九月寓言》等作品的获奖而提高了自身的品质与信誉，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接下去的一个问题是：上海本地作家处在近水楼台的有利地位，应该以怎样的姿态来显示上海文化环境的自身的优势呢？提出这个问题我想不会是多余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王恩重）